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5个数据读懂中国经济潜力系列报道之④

逾60%：城镇化仍有巨大潜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透视

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如何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专家认为，应加快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19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0%，这是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如何抓住城镇化带来的机遇，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

过去1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约提升1个百分点。2019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从城镇化率看，我国基本完成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目标。”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夏丹表示，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如巨舰前行，但不同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国缩小城乡二元分化、破解地区割裂分散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约为50%。然后我们用了将近10年时间，使城镇化率迈上了新台阶，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说，近年来，许多“新市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农民变市民，既带动了消费市场空间稳步扩大，推动了消费升级持续加快，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翼飞分析说，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城镇化率超过60%以后，城镇化速度会出现一定程度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将发生一些变化。

“过去，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城镇大规模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了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城镇化推进速度放缓，要素集聚速度会下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将从供给端转向供给、需求双驱动。”蔡翼飞说，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规模已超过8亿，挖掘城镇人口的消费潜力，将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等结构性失衡问题。而且，随着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有必要也有条件下更大力气去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蔡翼飞表示，当前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因此，要通过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路子，加快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专家还表示，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释放巨大内需潜力

尽管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空间，城镇化过程中蕴藏的经济发展潜力更是巨大。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推动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对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蔡翼飞表示。

“城镇化会直接带来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升级。”夏丹说，旧城改造、智慧城市建设将加快；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规模也会不断扩张；新基建也将进一步提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机遇也会更加明显。夏丹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功能的调整提升有利于推动产业空间布局重塑，形成更为合理的区域协调分工。同时，“排头兵”能更多肩负高精尖技术研发应用和产业升级职能，引领智慧城市兴起。

在徐洪才看来，城镇化率每年继续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农民变成市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会带来水、电、气、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从而带动消费需求规模扩大和档次升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汪彬表示，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一方面，大城市将更具针对性地解决“城市病”问题；围绕都市圈、城市群互联互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资机会将大量释放；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商业便利化改造也会带来巨大投资空间。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补短板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表示，从另一个角度看，城镇化建设也是促进就业的重要出路，对于完成“六稳”“六保”工作任务有很大促进作用。

推动农民变市民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至70%的快速发展区间。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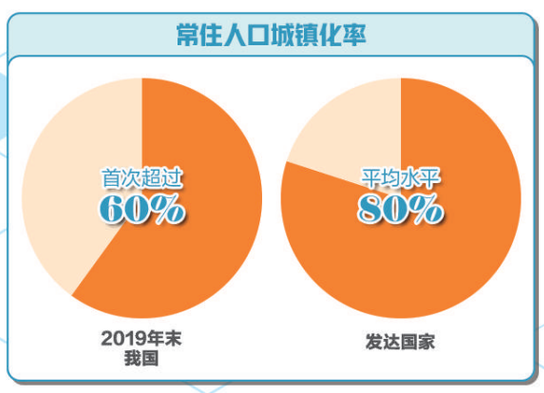
“如果没有产业强力支撑，城镇化就可能产生‘空城’‘鬼城’。”徐洪才建议，要重点解决好产城融合问题，要通过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城镇化质量提升。这就必须加大对农村转移人口的劳动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素质与产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帮助农村劳动力更好地在城市安家落户。

徐洪才还建议，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使基础设施水平与产业发展相适应，努力为各类生产要素的适度集中创造便利条件，使产业的集聚效应得到有效释放。

夏丹告诉记者，当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5%，这意味着城市中许多人没有享受到与户籍绑定的城镇人口权益。因此，要围绕“人的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化质量。一是与生存相关的质量问题，包括就业结构、大城市高房价、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二是与户籍相关的质量问题，在放宽落户条件、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同时解决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服务的供应和匹配度；三是城市建设相关质量问题，如智慧城市的更新与转变、土地资源的利用和改革、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提升、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等。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蔡翼飞建议，当前，一是要进一步放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尽快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的Ⅰ型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落户限制，并逐步取消其他城市落户限制；二是提高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提高其融入城市的能力；三是提高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意愿，维护好进城农村贫困人口的权益，消除其后顾之忧。

蔡翼飞还表示，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一些领域形成了短板弱项，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要注意解决好城镇建设的投融资机制问题，精准确定投资领域，特别是要确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大，但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引导的公共领域，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专家学者热议如何以“六保”促“六稳”

政策要看得懂用得上

本报记者 欧阳优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交织叠加挑战，“六保”“六稳”目标和任务如何实现？在6月16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专家表示，“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着力点。以“六保”促“六稳”，必须在“精准”“有效”上下功夫。

“就业恢复不能等待经济复苏，而应该是经济复苏的逻辑起点和发动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特别强调，就业需要政府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恢复并保持新创企业增长速度，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为多种所有制、多种业态、多种经营模式和多样化就业形式创造更好条件。二是针对不同失业因素综合全面施策，扩大公共就业服务范围，提升政府援企稳岗措施实施效率，通过社会政策托底民生。三是加大人力资本培养力度，扩大高中、高职和高校招生规模，提供技能培训等，以工代赈，从而抵消劳动力市场失灵的消极效应。

“在这次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必须把就业和民生放在第一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给出了两条思路：一是继续发挥消费券的促进消费作用，建议采取消费券不绑定特定使用用途的方式，使消费券的效用得以更好释放。二是应对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采取多种方式，把他们纳入社保的保障范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保市场主体，应有专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机构，对小微企业的内在需求精准把握、准确触达，特别要创新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方式，精准施策、对症下药。

谈到如何精准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保市场主体不能“撒胡椒面”，必须利用大数据等手段精准施策，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值得保的市场主体中去，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在这一过程中，既要通过海关数据、增值税数据、社保数据等，精准识别企业的受冲击类型和领域，还要根据受困企业的受冲击因素，因企施策、精准发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则表示，精准有效支持市场主体，要特别注意三个特殊问题：一是制造业中的隐形冠军类中小企业，并非处在某条产业链中，而是面向全球产业网络，需要特殊支持。二是对于服务类短链中小企业，可以直接支持，更应该利用消费类平台支持。三是全球不确定性如此大，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应该允许企业有不同选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对如何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出了五条建议：一是继续开展全球产业链合作，解除不必要和超标准的管制措施，建立快速通道，保障国际物流畅通，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二是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更好保护外资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三是做好极端情况下供应链应对预案，营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供应链形态；四是下决心推动可能“断供”的短板产品的国内替代；五是顺应产业链区域化特征，加强东亚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供应链链接和合作。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落实“六保”任务，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应从企业需求出发制定政策。特别要听取市场主体的意见，保证政策管用，让基层、企业都能看得懂、用得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则提出，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坚持底线思维，还要特别重视政策支持的量和度，应理性克制、留有余地，做到稳杠杆不能丢、防风险不能忘。

微信红包也有假 别贪小利吃大亏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日前，微信群里出现“京东集团为回馈社会全民派发购物津贴”的链接，后经各方核实，证实该链接系传播虚假内容。对于类似的“假红包”，人们要提高警惕。

记者从微信团队了解到，诈骗嫌疑人会把“假红包”链接的封面，包装成各种容易让人上当的形式，如一条逼真的语音消息、邀请加群提示、“我已经领到了”等，以各种正规名目吸引用户点击，并伪造页面内容，诱导用户再次转发。由于“假红包”通过微信的好友关系链传播，容易让用户降低警惕性。用户收到由好友转发的“假红包”链接，出于对好友的信任，容易点击而上当。

点击虚假红包链接存在哪些风险？北京朝阳区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肖圣雷提示，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木马程序风险，手机权限开放风险，财产损失风险。

“正常的红包点击即可领取，但是虚假的红包链接以红包的‘外表’并结合热点吸引用户点击。一旦点击后，要求用户填写个人的身份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等，存在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嫌疑。”肖圣雷说，部分不法分子以红包吸引用户点击，在链接中诱使用户下载木马程序，在用户手机中植入木马病毒，进而控制手机中的相关功能，实现其他非法目的。此外，用户在点击虚假微信红包链接过程中，可能被要求开放手机的存储、定位等权限，不法分子从而非法获取相关信息。

肖圣雷分析，不法分子通常利用虚假微信链接骗取钱财。在虚假链接中，通过收集信息、模拟正常支付、提现等手续，诱导用户在虚假页面中输入支付密码，同时在后台非法获取支付密码，并最终利用支付密码获取用户在微信或者银行卡中的财产。

法官建议，防范虚假红包链接对自身造成的风险，首先应当提高防范意识，形成对微信红包的正确认识，杜绝占便宜的心理。遇到好友发送的可疑红包链接，需要从好友发送红包的合理性上充分分析其真实性。

其次，要提高辨别能力，要求用户输入信息、下载程序或者完成其他与正常领取红包不一致的操作，通常是虚假红包，应注意分辨。

再次，注重个人信息保护，对涉及个人自身利益的信息，如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信息、支付密码等，不在可疑链接中随意输入，避免信息泄露。要谨慎对待可疑链接申请获取的权限，避免链接利用权限收集信息。

最后，如遇财产损失及时止损，可向微信平台、银行等及时申请停止支付，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协助公安机关收集证据。

微信团队表示，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会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微信平台协议作出相应处理，欢迎用户通过投诉举报提供相关线索，核实后会进行处理。

行业风向

多地放宽落户条件，有的地方推出“零门槛”政策——

人进城 留得住 能发展

本报记者 熊 丽

今年以来，多个城市相继出台政策放开落户限制，有的地方甚至可“零门槛”落户。这将有利于增强城市活力，发挥城市规模效应，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下一步，不仅要让人才落得下，还要留得住、能发展。

今年以来，苏州、南昌、沈阳、济南、南宁等多个城市纷纷出台新政策放开落户限制，有的地方还可“零门槛”落户。这些落户政策有什么新看点？

“零门槛”落户彰显诚意。如江西南昌将全面取消南昌市城镇地域落户的参保年限、居住年限、学历要求等迁入条件限制，实行以群众申请为主、不附加其他条件、同户人员可以随迁的“零门槛”准入政策。再如，6月1日，山东济南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提供人才、高校学生、居住、就业、亲属投靠及其他共六类“零门槛”落户途径。广东江门市也同样取消落户限制，“零门槛”准入。

年龄、学历条件再放宽。如浙江取消父母投靠落户年龄限制；济南取消了中专学历人员参保限制、技术技能职级限制。

先落户，后就业。如苏州新增“先落户再就业”条款，只要是在国（境）外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并取得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的留学人员、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及学士学位以上人员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可直接申请办理落户；山东省也全面放开对高校在校生、毕业生的落户限制，全省16市均可先落户后就业。

无房能落户。如浙江支持孵化器、众创空间、特色小镇等设立集体户，取消集体宿舍的条件限制，允许人才公寓、酒店式公寓设立集体户，推行设立社区（村）公共集体户；济南市规定，租赁居住经住建部门登记备案住房的人员可在租赁住房处或租赁住房地的社区集体户落户。

亲友家也能落户。如济南将亲属投靠范围由原“夫妻、子女、父母”三投靠扩大至全部近亲属，将亲属随迁范围由原“配偶、未婚子女”扩大至配偶、已婚子女、父母。

手续更精简。如河北张家口市允许公民自择地点落户，实行省内“一站式”办理；河南信阳不再要求群众提供各种证照和材料复印件。

来去可自由。在广西南宁，农村户籍大学生无论是已毕业、新入学还是应届生，都可以享受自愿原则，申请将户口迁回原籍农村。

《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认为，实现1亿人落户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重要举措，省会等中心城市往往是就业、公共服务、生态等综合承载力大的城市，有责任也有能力打开大门迎接新市民。目前，省域中心城市本身作为省域经济动力源的作用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只有聚集更多人才人力，才能承接更多产业，逐步成为更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增长极。

“正因为如此，很多大城市在面对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个问题上，正从‘半推半就’转变为‘争先恐后’。”马庆斌说。

“近期，一些地区正在对落户松绑，这将促进人口向城市进一步聚集和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有利于增强城市活力、发挥城市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庆华认为，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城市人口特别是优质人力资源的聚集，对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让人才不仅落得下，还要留得住、能发展？马庆斌认为，首先要在多元化就业上下功夫，打造一个充满机遇的活力城市，“能否安心生活，关键在于有没有适合各种人群就业的多元化就业环境，既要让新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也要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传统制造业本身就是孕育新产业的土壤和载体”。

其次要有多元化教育，既要关注更高质量的学历教育，也要注重职业技能教育，更要关注幼儿和老年教育。此外，还要提供更具品质的城市生活。早已脱离温饱的城市居民，需要更多文化精神消费，因此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规划博物馆、图书馆、健身房、科技设施、公园和绿地等。

在6月1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强调，要推动各类城市，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集中流入的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继续完善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并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分布和结构来配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本版编辑 杜 铭 孟 飞 张 可